

#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 卷二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 第三篇 彭德怀篇（下）

#### 八、彭德怀的简历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

性格：粗中有细。

军衔：元帅。

处事方式：原则性强。

生活方式：艰苦朴素。

理想：中国人不受欺负、不挨饿。

彭德怀，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七四年。

官方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

说真的，这些华丽的评价有点空。并不是说彭德怀不配得起这些评价，以彭德怀一生的经历来看，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之所以说空，是因为把彭德怀的名字换成贺龙或者其他，同样成立，并不能突出他的个性特点。

其实不需要这些华丽的修辞，在我看来，彭德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说彭是革命家也好、军事家也罢、或者政治家（水平不怎么样）也可以，前提都是\_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实实在在地面对困难，从不妥协，因此才得以百炼成钢，从一个赤贫的被欺凌者成长为带领志愿军和美军较量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上集体沉默时写了一封信。

彭德怀出身寒微，长于贫困。

面对贫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默默忍受，行尸走肉一般活着；要么反抗，摆脱贫穷。彭德怀是一个实在人，想法很朴实，凭啥就要忍？所以他选择反抗。

反抗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像愤青一般无休止地抱怨，也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好好干活。在任何时代，抱怨都是没用的。朴实的彭德怀是不会干这种没用的事的。

当时工作的环境很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当时的成功人士都是地主恶霸之类，能提供的只有欺压盘剥。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当兵了，所以彭德怀当了兵。当了兵就可以吃饭、成为成功人士不受欺

负，却要忍受军官的欺负和死亡的威胁。要减少军官的欺负和死亡的威胁，最好成为军官。成为军官是多数大兵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的人却相当有限，千军万马独闯木桥，比当今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更难。好在彭德怀还是过去了，还混到团长。

能成为军官已经是军人之中的成功人士，然后彭德怀并不觉得成功，他看见中华大地上的黑暗，看见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想起自己受欺压的往事，看见那些为了吃口饭而死去的大兵们而感同身受。如何解救他们呢？彭德怀用他那淳朴的头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淳朴的答案——消灭那些不平等。消灭不平等就要消灭支持不平等的力量。

好吧，那就起义。从此虎啸深山，对邪恶和不公张口血盆大口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红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由于在部分地区作战失利，部队缩编为5个大队。这时湘鄂赣三省敌人举行“全剿”，红五军在突破敌人包围后，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精神，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战斗，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彭德怀和黄公略搞了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并且效仿其它地方建立了湘鄂赣根据地，再后来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壮大中央军。这里简单提一下黄公略。黄公略，黄埔三期，井冈山时代和彭德怀、林彪三足鼎立，后战死。若不死，可能成为元帅。虽然英年早逝，依然位列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

在井冈山飞历次反围剿中，彭一直在战斗。彭德怀和林彪，是历次反围剿之中最为重要的将军。这种实实在在的风格一直延续下去，长征途中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更是如此，责任越来越大，担子愈来愈重。

抗日战争时期，彭只策划了共军抗日时期最具影响力一战——百团大战。这一战和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想相违背。按照当时的态势，共产党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战打了鬼子，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的抗日明信片。

到了解放战争，中共力量放在东北、山东、华北，陕北力量非常薄弱，又成了老蒋重点进攻的对象。危难之际又是彭奋然而起，率领两万西北野战军保卫中央，周旋于胡中南二十万大军中间，最后成功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解放战争中，彭的战功并不是最显赫，力量不是最强，担子却是最重的。稍微闪失，后果很严重。

最重的担子当然是抗美援朝，在正选缺阵的情况下，作为替补接过帅印，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打赢一场武器装备最为悬殊的战争。

这一串串辉煌堆砌成一个伟岸的军人形象，伟岸形象背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在庐山上说了实实在在的话。其实彭的语气比起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已经很客气了。

真正彰显其个性的还是那封信。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惊世骇俗，因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环境中，所以显得特殊。

庐山事件之前，彭一直在干着军人的活，党内地位不高，很少插足政治。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掉入了政治泥沼。和当时的军内大佬一样，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趟政治浑水。

就算政治觉悟不高，彭也能明白，他是没有机会接近最高权力的。毛对彭的态度和刘少奇一样。刘少奇的党内地位高，还能当国家主席，但不能在军方生根。彭德怀可以在军队建立赫赫威望，但在行政系统内就是一个婴儿。

史载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开始，一切仿佛回到解放前，仿佛来了一个轮回。既然回到原点，那么自己征战一生又有何意义？不满再次产生。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政治涡流中逆流而上，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地面对一切。

因为庐山会议后面，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有多严重？没人能说出来有多严重，也没必要说出来，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最保守估计，两千万以上的人饿死。注意，不是老死、病死、出车祸或者其它，是饿死。人吃人的现象随处可见，从官方记载到民间传说都是证据。

悲惨状况，历史罕见。

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它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真相拿出来的人，唯一敢面对现实的人，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

## 九、庐山事件——政治丑闻

江西九江，庐山天下闻名。

庐山之名，名在其雄壮；庐山之名，名在其奇巧；庐山之名，名在其险峻；庐山之名，名在其秀丽，故世人以雄、奇、险、秀概括庐山——祖国南岳。

滚滚长江从北方东逝而去，飘渺诡异的鄱阳湖一万年相伴于东方，京九铁路从西部贯穿南北，南方有滕王阁千年相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这个意思吧。

庐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又有江湖环绕，视觉极好，是养生修道的好地方，相传老子就曾在这里修道成仙，留下一座空庐，庐山因此得名。后来达摩老祖的传人也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建了庙宇。后来又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此开疆辟土。就连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同志也禁不起欲望的诱惑，来庐山重建白鹿洞开课讲学。

陶渊明来了，写下自己的乌托邦大作《桃花源记》。

李白看见庐山瀑布，天才脑袋再次开花，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居易漫无目的地来到大林寺，心中一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如此这般，数不胜数，一一罗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史。

正因为庐山如此美好，庐山事件更显得不可思议。

古时候人烟稀少，庐山是修仙修身、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到了现代，人口急剧膨胀，自由度增大，每个人都可以看看当年的仙人洞啊、道观啊什么的，庐山成了旅游修仙的好去处，也就是出点钱的事。

此外庐山还是开会的好地方。当年蒋介石喜欢在庐山开会，最为有名的一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号的讲话，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这是蒋介石最为高光时刻之一，被载入史册。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选择在庐山开会，平生召开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九五九年夏，庐山迎来千年以来最痛苦的记忆。

炎热的江西境内，庐山和千百年来一样清凉宜人。然而这一年和往年不大一样，这一年的庐山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亲历者莫不深感阴冷。

五九年夏，新中国的英雄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庐山。他们都是人杰，都是英豪，要么是军队的

砥柱中流，要么在一方呼风唤雨。他们都曾出生入死过，各自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赶往庐山接受新的残酷的考验。

史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号至十六号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

大会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和后半段。七月十四号之前为前半段，曰“神仙会”；十四号之后为后半段，起个名字，应该是“魔鬼会”吧。让我们来看看“神仙会”怎么就转变成了“魔鬼会”？

会议原定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从七月三号到十号，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空闲之余还能游一游庐山胜景，享受生活，史称“神仙会”。

会议过程还是老一套了，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更为实际一点，另一部分人对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十号，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并告诫同志们，回到自己的地盘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我毛泽东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神仙会”。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庐山会议本来决定纠左，因为那个彭德怀的捣乱才变成了反右。包括在刘少奇的传记里，都是这个论调。好像没有那封信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需要澄清一下：大饥荒根源于“三面红旗”指导思想以及当年那个正在官僚化的官吏机构。

只要毛泽东还在强调大跃进有道理，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合作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认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只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还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只要下层官僚对上层官僚如同下层军官对上层军官那样惟命是从，那么——大饥荒就将不可阻挡地要到来。

其实大饥荒已经到来了。所谓大饥荒就是五九年到六二年那段时间发生，庐山会议是在五九年下半年开的，粮食已经紧缺，全国境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出现。就好像一次战役，失败的兆头已经显现了，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还开什么“神仙会”？！

神仙会原定七月十五号结束。会议结束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号，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以私

信形式写的。写信之前他试图会见毛泽东，未果。

若干年之后，等那个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

彭德怀的信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 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 年较 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48.4%，其中工业增长了 66.1%，农副业增长了 25%（粮棉增产 30% 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 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 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 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 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 4 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 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 1958 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 20 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 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 30 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 18 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



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 十、毛泽东的态度

在高岗事件中，提到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情形。

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信的口吻已经相当温和了，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作一个普通人，这封信可能就被淹没了。可怕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问题，像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得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砸他们的饭碗自然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从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共产党的会多是出了名的。在平时的情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把远在天边的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团结。每到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渡过难关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烟消云散了。

如果仅仅是这些想法，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毛彭两人之间关系的一件证物而已。

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再晒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大家继续争吵。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在党史上，出现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的情况，就意味着这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的高岗如此，如今的彭德怀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

毛泽东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的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

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的政策。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反对者统统打倒。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等到七月二十三日，支持者和反对者吵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开始批彭德怀，以及支持彭德怀的那些人。彭德怀的命运就此决定，不可逆转地跌入深渊。同时落入深渊的还有黄克诚等人。

于是“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大家张牙舞爪，争先恐后地攻击彭德怀，有人泼脏水，有人扣屎盆子。

会议延长了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还不过瘾。时间不够，那就再来一场会议，八月二日到十六日，半个月时间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内容主题只有一个：彭德怀同志是个坏人。

在一群精英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月之前还是战功赫赫，具有国际声望的彭大将军，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党内可疑分子，而且臭不可闻！

毛泽东本来可以把彭德怀抛在一边的，为啥转变态度又把他拖入深渊呢？

我认为毛泽东要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

从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在这三十七年当中，两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就是恩和怨。

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两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地回顾一下。

## 十一、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恩情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来的队伍，接下来等到彭德怀和滕代远带来的队伍。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两人的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

彭德怀带队上井冈山时，井冈山朱毛实力一般。而彭德怀带来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战斗能力强于朱毛的游击队。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的进攻。

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已是人困马疲。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此时由于中央的决策不咋地，中央机关行动缓慢，眼看就要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拉出虎口。

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飞。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是哪个人出了力气的。

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

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殊死相搏中。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再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远强于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左路军是张国焘的天下。中央红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在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徐向前和陈昌浩。这两人当时被看做是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得了彭德怀和林彪。

到了九月，红军艰难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境内的中俄边境，和中央相隔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在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扎在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的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

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两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中央，也

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的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再来个权力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

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是毛泽东的生日，他没心情庆生，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两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昌浩继续北上呗，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的办法，那是没有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很难做，自己出身四方面军，算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吧，中央红军领导得不咋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

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的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天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合。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

中央转移时形势非常紧张，拉了警戒线，像行军打仗一样。有人把情况反映给徐向前，询问要不要采取措施，徐向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因为这句话，毛泽东感激徐向前，即便后来西征失败，仍让徐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但是毛泽东也无法忘记徐向前听命于张国焘，所以一直把他冷藏不用。

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此后，彭德怀就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的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

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拳头。

彼时延安异常空虚，中央怕被一锅端了，分开刘少奇等人东渡黄河，毛泽东本人则坚守陕北。此时保卫中央以及毛泽东的还是彭德怀。彭德怀率两万西北野战军护卫中央，周旋于胡宗南的二十万西北军之间，以其彪悍的风格和灵巧的战术，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直到最后解放了整个大西北。

毛彭两人最后一次携手共进是抗美援朝。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累述。

再谈谈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怨恨：

先谈一谈政治包袱。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

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每个人都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跟随过张国焘，一辈子都胆战心惊。

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

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最后成了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所有背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的政治包袱最大、最多，却又最不知道收敛。

两人之间第一个芥蒂——错杀王佐、袁文才。

毛泽东上拉枪杆子之前，在井冈山已经有一帮绿林届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处境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这两个人给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党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年之后，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顿时手脚冰凉，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

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组长，既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的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户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将他们的队伍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开

会啰嗦两人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他们两人有罪。两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

彭清泉虽然是中央巡视员，却是个软骨头，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增援。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感到事情紧迫，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

毛泽东对两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他们，他们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彭德怀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

附：

王佐和袁文才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 1898 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

王佐，原名王云辉，生于 1898 年，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

两人同年生，同日死。

彭德怀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二个阴影是林彪惹出来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得到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推上台。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以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就一起完蛋吧。

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些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的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场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渡赤水的意义吧，就是会



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得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的关系更近）。

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火光，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说：你个娃娃懂得啥哟？！

其实林彪的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彭以前也干过。毛泽东为啥如此火大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稳脚跟，大家把他推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的手上，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军事指挥权。

当时的毛泽东处于人生最为困难的时期，前有王明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沉寂下来，一直到庐山会议的召开。

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其实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的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第三个芥蒂应该是百团大战。

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着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的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了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个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那些芝麻豆子都没兴趣了，但一定会记得他打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影响力最大。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到四一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一九四零年下半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正蹂躏欧洲，东京和柏林会师印度的梦想很有可能成真。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陷入低潮；汪精卫在南京登上汉奸宝座。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黑夜中。这一战恰到好处地吸引了日军，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增加日本诱降中国政府的难度。这么打，才是真正的国共合作。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的后方，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啊？是啊，影响太大了！

但后果很严重：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强了鬼子进村的力度。

第二个后果是老蒋很在意。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高兴才是。老蒋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得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那还得了？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都给占了？！不行，得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也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事变。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的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从大局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错！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的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露了八路军的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

和敌人对撼。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既干领袖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呢？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的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藏。

因为这个百团大战，两人一度产生裂痕。因此在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的职务是解放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谋长这个位置根本就不适合彭德怀这种人，那是叶剑英或聂荣臻干的活。说白了，就是彭德怀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险恶，彭德怀估计要当徐向前第二了，后来能不能挤进十大元帅都难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

## 十二、毛岸英事件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毛岸英是毛泽东长子。

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倾注无尽的心血和希望。

毛岸英也没辜负父亲的栽培，成长为一个很棒的年轻人。

童年时代的毛岸英，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元素。一九三零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捕入狱。八岁的毛岸英连带入狱。随后杨开慧牺牲，毛岸英被地下党带到上海。组织被破坏之后，毛岸英兄弟浪迹街头，为了生计，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凡是能换到面包的活都干。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的地位巩固之后，毛氏兄弟才有机会去苏联学习。

苏联期间，毛岸英学习军事和政治，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曾在枪林弹雨中转战欧洲。十年之后，国共争霸开始之际，二十四岁的毛岸英返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看见青春挺拔的大儿子如同看见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百感交集啊。

为了表达对儿子的爱，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工作——下地干活。按照现在的人的思维，贵为强力组织一把手的长子，好歹也得安插在一个轻松体面的岗位上。毛泽东不同，他要给儿子好好补上一课“劳动大学”。

等到建国那会，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已经经历了童工、留学生、农民、战士、中国共产党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等多种身份，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办事足够干练，达到了父亲的要求。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了。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但毛岸英依然按照父亲的意思加入志愿军。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之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让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的将领在内都反对的情况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决定出兵的。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捞取资历，其它方面的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

度。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然而毛岸英偏偏死在了朝鲜。毛岸英的死，有很多版本，这里就不累述了。

毛岸英死在朝鲜是一个偶然，也可以理解为彭德怀的失误。彭德怀身边那么多重要人物都平安无事，怎么偏偏就是毛岸英？看着毛岸英的尸体，彭德怀呆呆地望着苍天：“为啥是他？为啥是他？”为啥是他？无数人在问。即使是毛泽东，夜深人静的时候，点燃一支烟，也会时不时想起这个问题吧？人心都是肉长的。

不论后人如何粉饰，毛岸英肯定是一个横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巨石，冷却着两人之间的温度。后人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毛岸英不死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猜测，结果有两个：接班或者不接班。流行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毛岸英会接班，成为毛二世。毕竟那年头接班很流行。朝鲜金氏搞接班，台湾蒋氏也在搞接班。以此类推，大陆的毛氏很可能也会搞接班。如果搞接班，究竟是像朝鲜金二世那样继续搞封闭，还是像台湾蒋二世那般搞建设？已经永远没有答案了。

然而事实还有另外一面：毛泽东既不是金日成也不是蒋介石。相比金日成和蒋介石，毛泽东有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发动历次运动（后面会重点分析）。这些运动给新中国造成了很大损失。那样的运动只有毛泽东才有威望搞起来。如果毛岸英活着，接班，七六年怎么办？继续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如果不搞文革，相当于背离毛泽东的政策，也将失去毛泽东支持者的支持，凭什么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较量？

也可以朝好的方面想，毛岸英不死，也轮不到江青上串下跳，以毛岸英的经历和修养，应该可以中和掉毛泽东本人一部分的狂热。说不定就不会有文革。毛岸英能接班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文革不发生。对很多人而言，宁愿毛岸英接班也不想要文化大革命，不是么？然而文革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后面的故事。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毛岸英是不是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的原因所在？

以毛泽东对毛岸英倾注的心血来看，毛泽东有可能就毛岸英问题拿掉彭德怀。他有理由责怪彭德怀，因为彭德怀确实没有保护好毛岸英。

毛泽东要拿下彭德怀易如反掌。因为毛是最高领导，彭只是最高领导下的一个部长。领袖拿下部长理由并不难找。像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功劳同样很大，也给拿下了。但朱可夫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不是一码事。庐山整掉彭德怀，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并非“拿掉一个国防部长”这么简单。否则也称不上“整”，也没有所谓“冤”。

个人观点：如果仅仅为毛岸英报仇，毛泽东不会在一九五九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头拿下彭德怀，代价太大了。他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之前或者之后都可以。政治家都是务实的，不会头脑发热而不计后果。

因为在一九五九年，毛的经济路线进入死胡同，山雨欲来，巨大的灾难气息已经相当明显了，并不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最佳时节。如果毛岸英没有死在朝鲜，毛泽东对彭德怀会宽容一点么？个人理解是，该来的还是会来。彭德怀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即使钦佩毛泽东，也不会盲从。他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结论是，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庐山都会写信。只要写信，有没有毛岸英事件，彭德怀的待遇都不会变。

毛泽东拿下彭德怀，另有隐情。继续分析之前，顺便驳斥另一个观点：即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因为功高震主。彭德怀真正能功高震主是在长征之前。长征之后的彭德怀就没机会了，他的红三军团基本上已经被打残了，特别是延安整风之后，就更没机会了。

隐情是什么呢？就是刘少奇。

### 十三、彭德怀和罗瑞卿、贺龙之间的恩怨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的利益最大就行了。就军方来讲，最大的受益者有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被绑上战车。

说真的，仅仅是看到这些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却把他们推到政客的位置上。

政治让人疯狂。

罗瑞卿说：“历史上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多半都参加，三成合作有些还是看形势，搞投机的，有些是合乎他的口味才合作的。”

罗瑞卿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得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之后，罗大将军同样被打翻在地，还跟彭大元帅同在一个屋檐下——在同一个监狱里。

罗将军和彭元帅并无深仇大恨。当年彭和罗同在北方局，也没见传出不和。

罗大将为何如此卖力批判彭元帅呢？原因很简单：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当时有一个说法：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影子。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才选择罗瑞卿做公安部长。在当年那个国家新建，土匪一大堆、特务一大片的情况下，公安部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还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就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如何显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说那些话，罗将军自己也过不了关。

需要指出的是，罗瑞卿对毛泽东的感情绝对是真实的。

文革罗瑞卿挨整，落下残疾，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得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第二件事就是回家为毛主席设灵堂，臂上戴黑纱。女儿罗点点迷惑不解，罗瑞卿训斥：你小孩子懂什么？

庐山会议之前，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正部级别。庐山之后，罗瑞卿变成总参谋长，级别降低了，

怎么能说得利了呢？因为当时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失败了，需要牢牢抓住军队。总参谋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要害部门，当然要用自己人。所以说罗瑞卿还是得利了。只是后来罗瑞卿偏离了林彪，才遭来灾难。

在利益、前途、感情面前，罗将军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他也不是庐山上决定作用的那一个。

和罗大将军不同，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关系比较复杂，芥蒂也比较深。

庐山上，贺龙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的。”

贺龙批彭德怀，除了政治选择，要紧紧跟随毛泽东外，也夹杂私人恩怨。

从流传的资料来看，彭贺矛盾可谓盘根错节，源远流长。

最早应该是段德昌问题。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红军时代杰出的指挥官，威震湘西。十大将军之一的许光达将军，当时是其下级。现在段德昌的身份是第一号烈士。但是这个烈士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被杀人狂夏曦整死的，死得悲惨而且悲壮。夏曦非常搞笑，此人号称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吸收过苏联的精华，实际上除了杀人啥也没干。整个红三军，被他从几万人杀到几千人，差点连贺龙都杀了。可以说他短短的一生就是为了杀人而活着。

段德昌和彭德怀的关系非比寻常。

彭德怀出身旧军队，是一个豪爽而血性的汉子，很想干一番事业却找不到出路。后来终于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了。促使彭德怀入党的人就是段德昌。“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年后，而且身在狱中。

段德昌的死对彭德怀的刺激非常大。当时段是贺的下级，到延安之后，知情人贺龙也没有就段的问题和彭德怀沟通过。造成彭德怀对贺龙不爽。

接下来就是贺龙对彭德怀不爽了。

一九三七年中共又反对一个主义，叫反军阀主义。啥意思就不解释了，反正现在没有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了。中共历史上反对过无穷多个主义。反对这个军阀主义是有背景的。一年前，也就是1936年，西安事变搞定，促成了蒋介石抗日，老蒋不再进攻共产党了。这时候共产党就喘了口气，动手解决自家问题。

恰好在这一年，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葬送在西北。西路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全部家



底。几年之前，张国焘就仗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逼得毛泽东相当无奈。毛认为可以解决张国焘了，就说张国焘是军阀。反张国焘就要反军阀，反着反着就扩大了，在全军范围内反军阀。但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没有了，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当然没事，只剩下红二方面军可以反。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恰好在旧军队内当过军长，于是成了众矢之的。

叶剑英曾说，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当时彭作为负责人之一，对红二方面军严厉批判。反到最后，贺龙检讨。在那个时代两人的关系，可以引用毛的话作为旁证。毛说，彭说贺在政治上靠不住。

两人第三次纠缠在一起是在解放战争时代，这一次最为微妙。长征之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改编之后，彭就成了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员。名义上很高，但没有了自已的军队。当彭再一次拥有军队时，贺又没了军队。因为彭接手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就是贺龙的陕甘宁野战部队。

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兵力集中为两个拳头对山东和陕北搞重点进攻。当时陕北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应该直接当司令。很不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抽不开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毛遂自荐，说“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答应了，就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事之前彭也没和贺沟通。随后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回到延安，就没有军队指挥了。再后来，贺龙成了彭德怀的后勤部长。

啰嗦了这么多，也就是证明，彭贺两人之间有疙瘩。

唯有如此才能理解贺龙揭发彭德怀的出发点。贺龙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

要知道，毛最忌讳下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得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告洋状”有关。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又需要把彭打翻在地，正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牢骚（还是听来的）的话拿到政治局讨论。当然考虑到两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的实

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和罗瑞卿将军一样，贺龙元帅批彭也不负主要责任。

## 十四、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着后人的尊敬。

遗憾的是，他们三个人全部陷入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旁观者伤心。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粟。现在，林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旱雷般的吼声，用兵刚猛，长于临机应变。年轻八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地图发呆。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从小排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一直是林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的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在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的红三军团是最有战斗力的两股力量。

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老蒋洋洋得意地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的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在庐山上还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最给中共长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了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简陋的一点家当搞定整个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在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彪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之一。

林彪按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一贯风格，铁青着脸说，彭德怀你不要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之类的话。

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的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站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比较合适，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它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而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较为顺利。这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的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

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

吴法宪猛然抢过发言权，说：“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地盯着他，心想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好像那位连长是他亲人。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

这时台下又想起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头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喊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为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今少有。

林彪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爬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的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

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中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的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毛除外）最大的权威。

林之所以要批彭，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毛要批彭，林就要批彭。毛要挺彭，林就要挺彭。说句公道话，就算林彪是受益人，也是被动的，被绑上战车。这个结论有证据么？有。证据就是，在彭没倒下之前，彭德怀负责日常军委；彭倒下之后，负责军委的是贺龙和罗瑞卿。当然罗瑞卿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

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倒下之后，林彪的威望又上升了，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之中，能与之争锋的人没有了。在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林家军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为何要批彭？答案是很诡异的，因为刘少奇。

好汉钟伟：

钟伟（1915-1984），男，湖南平江人。

原名钟步云，又名钟德泰。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 十五、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是三月五号，彭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于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在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的时候，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彭的上级。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杂，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两人在具体事务上有交集，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没有办法，周恩来也没有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在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

不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的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此时却要经历长征中的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一个世界。当时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新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过了草地。此时的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在文革，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叮嘱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得住的。周恩来最

终依然没能保护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护其他人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两人关系，平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削弱了，虚弱到最后竟然只能管外交。

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掌权。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得够呛，快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庐山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只不过他批评得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得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犯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

其实彭德怀虽然是他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评价说的：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是要追究责任的话，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会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政府——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真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地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没有倒塌。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 十六、庐山会议的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在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贺、罗三人。但他们都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最大受益者是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乎颇为荒唐。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的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乍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不一样。

在毛的时代，军队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在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和刘本来就是军队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的差别（如彭德怀和刘伯承），而是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

彭是军人，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的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它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讨论过，那一战引起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的好处是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碉堡，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需要放火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这一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地冒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

一只眼睛盯着中共的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

后来毛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去了北方局。

当时的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给予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的“钦差大人”当得还算不错。

然而刘少奇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在喝完水之后，就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了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错了也就算了，但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留下深深的烙印。

延安整风运动，彭德怀挨了批判，做了检讨，刘少奇的地位高升至毛泽东的副手。

实事求是讲，在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的规律。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从政治角度去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的敌人不对么？政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从宏观角度看，刘少奇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的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治家，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对方是对的，也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他折腾得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加深了两人的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是军方大佬，偏偏就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看，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

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是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彭德怀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彭，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再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有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的人要搞军事政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么？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的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的党性是不是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是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做到底。

三年（新中国最为严酷的三年）之后，刘少奇于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

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再次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再吃一吃不嫌多。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都转进彭德怀的肚子里了。”——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如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打翻在地，再泼上屎尿。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接班。在没有接班之前就 and 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

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的。刘少奇已经很成熟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的《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的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在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置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按照当时的势力，两人放开手对干，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队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的手上，而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 十七、毛泽东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开会开得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都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有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的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了那份信之后，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在文革中要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也就是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地给点暗示。像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这样做？

还记得吗？在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之所以要拿下彭德怀，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两人之间的是非恩怨，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

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

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例如完全可以像把粟裕晾在一边那样。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建国十年，四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 十八、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围绕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一年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地流经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它，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种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是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很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地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

战争这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子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个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我们没有对它进行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

外战也有两个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识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予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太容易了，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顶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的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屁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种方式上去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的脑袋指挥政治家的身体的时候，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的时候，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的时候，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的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的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的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大片地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就是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由传统文化和当时的国民素质决定了要发生的悲剧。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得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它，穿插、分割、包围，这些招数都不行，甚至连和谈的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

很遗憾，在大跃进那个时代，理解经济规律的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的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的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的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会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这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在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查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呢？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渡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但仅仅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吃吃喝喝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外不干其他事；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

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这种官吏古来并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们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最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就要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有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什么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中央的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导致饿死人也要承担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的。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要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的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潜台词就是：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呢？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主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的那个官僚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

袖的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有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理人民还是有效的。渡过眼前的危机才是政治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究，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拿你们开刀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就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无辜的彭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将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的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官吏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事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

按古老的说法，这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正是他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人搞复辟”的结论。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拿下！但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庐山上的刘少奇胜利了，却也是毁灭的开始。度过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很快就发现，站在他对立面的不再是军方背景的高岗，不再是军内大佬彭德怀，而是巨人毛泽东。

是的，刘少奇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 十九、彭德怀的结局

既然说到彭德怀，那就多说点吧。作为历史人物，彭德怀的使命在庐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命运。本来不想多写。彭德怀的个人遭遇让人同情，还是多写一点吧。写彭德怀的结局之前，介绍一下黄克诚将军，和彭德怀一样是受难者，和彭德怀一样值得尊重，忽略了他是不应该的。

黄克诚于一九零二年十月一号生于湖南永兴，五五年领大将军衔。十大将军和十大元帅的排名不太一致。十大元帅中，谁第一谁第二很清楚。十大将军有几种排法。按照五五年授衔时的排列，黄克诚居粟裕之后，第二位。现在流行的排列中，黄克诚位居粟裕和徐海东之后，第三位。还有按照笔画排列的。这些只是趣谈，并不重要。

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的黄克诚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不过他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在湘南暴动中加入队伍的，早在二五年，黄克诚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评价：黄克诚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一生。

和很多人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同，黄克诚始终对事不对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他几乎在各个时期都和领导人争论过，结果都证明他对了。

黄克诚虽然参加湘南暴动，却反对滥用暴力。湘南特委要搞焦土政策，把百姓都焦土化了还有谁支持你？岂不是把自己变成鬼子？所以黄克诚抵制，结果只烧了衙门，民房、商铺啥的都保存了下来。

接下来耿直的黄克诚又反对李立山搞城市暴动，被批右倾。

在黄克诚耿直的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还不是庐山，而是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的“肃反”。说真的，中共最残酷的时代并不是建国后历次运动，而是早期肃反。后来的政治运动虽然残酷，但是比起肃反时代那种按照名单杀人的情形，已经非常幸福了。比方说夏曦同志单枪匹马就把红二方面军党员给杀得七七八八，做到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再比方说张国焘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把徐向前老婆都给杀掉了。可见其残酷性！

黄克诚的过错并不在于他自己有问题被肃反了，而是他反对肃反，说这样滥杀无辜是不对的。那时候大家基本上不敢多说话，生怕引起特委同志的注意。黄克诚倒好，不但说这么做不对，还用脑袋担保那些人没问题。特委一生气，就把黄克诚同志给肃了，军部处决之际，彭德怀从火线赶回救了他一命。没有彭德怀，黄克诚就要步段德昌的后尘了。所以两人关系很铁。

然后又反对王明，再一次右倾。

然后又在延安整风后期抵制抢救运动，还是右倾。

到了东北战场上，毛泽东命令坚守四平。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十万人与敌激战，消耗巨大。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开始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五月十二号直接致电中央。五九年庐山，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这样一路下来，我们发现黄克诚将军基本上和所有时期的领导都闹过矛盾。而且右倾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如果仅仅比右倾帽子数量，估计没人能比得上黄克诚将军，而且是每戴一次右倾帽子就要罢一次官。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再得到一顶右倾帽子，再一次被罢官。这也是他一辈子最后一次右倾，最后一次被罢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是在会议中间被叫上庐山批判彭德怀的，不同的是，他选择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黄克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是在报答彭德怀的救命之恩么？不，他是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也许黄克诚将军已经习惯了右倾的帽子，习惯了被罢官，但这一次真的有点长，二十年啊！一九五九年的黄克诚将军，五十七岁，正值壮年，二十年后再次复出，已经垂垂老矣。

复出之后的黄克诚依然故我。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丑化林彪，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真汉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号，黄克诚死，妻子唐棣华上挽联曰：“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忤人。”配得上这种评价的人极少，黄克诚就是其中之一。

黄克诚，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呢？看两人的性格就知道肯定不会和风细雨。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一直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但两人关系确实很铁。铁到毛泽东认为他们像“父子”。其实彭德怀仅



大黄克诚四岁而已，应该说像兄弟。

从性格和为人方面来看，庐山之上的精英们让这样两个人去组建“军事俱乐部”倒也般配。

经过庐山之上各路诸侯几十天的连番轰炸之后，彭德怀、黄克诚还是“认错”了，写了检讨。为了让彭德怀低头，那是费了很大劲的。

彭德怀的信写的明明是现实问题，一帮理论家却搬出历史问题算旧账。彭德怀信里说咱们现实的问题很严重，理论家们就说，你彭德怀历史上反党反毛主席。玩偷换概念。一大堆搞理论工作的攻击同一个目标的时候，骆驼都能说成马。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同理大兵遇到秀才同样有理说不清，被这么七绕八绕，估计给绕糊涂了。这是刚猛的一路，合力攻击。

还有温柔的一路，那就是游说。比方说叶剑英元帅，非常煽情地说，现在主席还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你？还有其它人也说，老彭你就别倔了，给主席认个错，他老人家是不会错的，接下来大家继续工作。这些人也是一番好意，比方说叶剑英元帅，那种情绪不可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他们都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也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选择。各种滋味，他们在八年之后，二月逆流时才能体会。

在辩论家口中，白马可以非马。但是在真理那里，白马永远不可能非马。严峻的现实终究不是靠舌头解决的。他们可以忽悠彭德怀写检讨，却解决不了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如果当年彭德怀不写检讨会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也许留给后人的形象更为光辉一点。尽管如此，他那有缺陷的身影已经足够高大。

彭德怀写了检讨，继续批判。庐山没批完，回到北京继续批。大家唾沫星浪费得差不多了，彭德怀带着满身口水的臭味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处旧宅种地去了。一边种地、一边念点书、一边写检讨、一边想不通。六年之后，又把自己的平生写成自述，类似于自传，给了毛泽东。一共不到十万字，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看。

中间诡异地去了一趟三线，在李井泉的监视下过了段时间。随后就落到红卫兵的手上。除了周恩来出面力保半年，其它时间都是备受折磨。别人遭受到的痛苦他尝到了，别人没尝到的痛苦他也尝到了，细节就不写了，心酸。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二十五分，饱受折磨的彭大将军，干过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事迹，承受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磨难之后终于解脱了，走完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

斯人已去，故事还在。作为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彭德怀恨毛泽东么？

按照一般观点来看，彭德怀应该恨死毛泽东了。因为彭德怀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放眼

这世界，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给彭德怀制造如此多的痛苦。而在这些痛苦之前，二人曾经亲密战斗，曾经彼此信任，曾经携手打下一片大好江山。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毛泽东。然而彭德怀最后给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一个中肯的陈述句，未见痛恨。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一般人不敢说不敬的话。

当事人已经不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彭德怀的内心的想法。我的个人判断是，不恨。至少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怨恨。

理由如下：

第一个就是彭德怀的个性。彭德怀是个直肠子，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藏不住话。如果恨到骨子里，在逝世前应该有所表现。虽然当年的政治环境恶劣，但彭德怀一生有几天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何曾当过孬种？八大期间他敢提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期间敢和毛泽东对飚，死前有怨恨还不敢发泄？笑话！

分析一下那封信的动机。

彭德怀写那封信应该是酝酿很久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神速。

上山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彭德怀做了很多调查。虽然他是国防部长，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虽然他知道军人干政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大忌，但是他不在乎，成为军人之前他首先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干事，实实在在打仗，尽管他有时候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甚至心胸狭隘。

彭德怀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这么做。不管是平江暴动，还是上井冈山都为了一个目的——首先自己不挨饿，其次是让自己这般挨饿的人不再挨饿，简单实在，如此而已。后来朝鲜挂帅，拿一世英名做赌注，目的也是求得和平，让穷人不再挨饿。庐山写信，动机还是一样。

——年岁大了，头发白了，我心依旧。

不同的人对庐山事件有不同的回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彭德怀的表情的描述：板着脸，没有丝毫表情，如同钢板一块，好像看谁都不顺眼。情形如此严峻，能笑得出么？

情形如此严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彭德怀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就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因为彭德怀没有能力解决灾难，只有依靠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高领导。历史上的毛泽东总有办法渡过难关。于是彭写了信，以私人名义给他信任的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彭德怀庐山写信的矛头可能是指向刘少奇的。他认为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把国

家搞成这样应该负责。但他首先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次才是私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为了私怨，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局势明朗一点再出手。但是他看不到当时官僚阶层的作用，在饥荒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了官僚只能天下大乱。

在此后的岁月里，彭德怀虽然个人遭受了巨大伤痛，但是放在那个时代的大痛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彭德怀恰好是一个关心天下的人。在那种天下人都受苦的情况下，即使受了很多苦也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偶尔抱怨一下，说卫兵给我一枪吧。偶尔给周恩来写信时加上前缀：今天被打狠了之类的话。而且他从没抱怨过毛泽东，因为他和那一代的同志一样，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问题，解决时代的痛。

所以我判断，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因为他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

## 二十、庐山会议的性质

庐山会议，本质上是一群人攻击一个人的会议。

原因竟然是那个人说了点真话。

一群人攻击一个人没有问题，搞审判时也是一群人攻击一个人。

但是当这个被攻击的人仅仅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攻击时，问题就来了。因为这表示一群攻击者已经背离了说真话的原则。说真话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群攻击者违背了真理。如果说这群背离真理的人仅仅是一群闲来无事、只懂扯闲话的也就算了，最多造成个人的冤屈；他们偏偏是精英，是实力强劲的人物，掌控着国家的命脉，掌控着亿万人的命运。

更大的问题是，这群卓越的攻击者明明就知道真理在那里。他们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都是一代英豪，都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和傲然的事业，都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知其不该为而为之，这就是悲剧的所在。

然而在庐山上，他们共同选择了疯狂。

庐山会议，就这样成了历史性的丑闻。

当年参与庐山会议者，除了已经身败名裂的林彪之外，无不讳莫如深。

庐山会议，一出精英扮演丑角的悲剧。

中共历史上运动无数次，按照现在的观点，每一次运动都有人蒙冤受难，为啥唯独这一次称为丑闻？答案是：庐山事件是虚假的，是为了遮盖问题。

下面来解释一下这个虚假。首先回顾一下其它运动。

抓捕“AB”团，很残酷，错抓了不少人，但是联系到当时的情况看，必须有一次这样的运动。因为根据地四面被包围，敌人从各个方面渗透进来，大伙的处境极为严酷，必须清理。

延安整风，错整不少人，但也通过整风重新整合了共产党，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消灭了军内山头主义，有利于后来解放战争中的统一指挥。

彭德怀亲自主持的反教条运动，错批了刘伯承等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统一军队思想。

就连很多人咬牙切齿又有很多人念念不忘的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也是整合官僚集团。

唯有庐山事件，出发点和目的都一样：转移注意力，掩盖一个真相。

真相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政策破产，以及实际上已经到来的大饥荒。

首先声明一下，三面红旗的旗手是毛泽东，正如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

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

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毛泽东同志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苏联的一把手，家大业大。毛泽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

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买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

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潮。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很好地完成了领袖的职责。

五五年十二月四号，毛泽东发表讲话反右反保守，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快、好”。

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一个“省”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12月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又过了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的。大家非常重视，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毛泽东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原则性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的执行。而当时的

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的规律，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地工作，挣那份死工资，胆子小点的，会不停地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这中间有可能发财的，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皇粮。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

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地到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

在我看来，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它的最大的弱点也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嘛？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一起抵御敌人。

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统一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来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来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的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的现状。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

过了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又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

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驾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的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的思想成就。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得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在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朱元璋，或者其他入。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的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执著于毛泽东的战功，贬毛泽东的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 第四篇 大饥荒篇

### 一、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只要给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轮替，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重新分配。

每一个王朝初期，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的钱粮。中央政府就有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扬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的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分配，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的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的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的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对此的教训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这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边无际，当他要批彭德怀，彭德怀就得完蛋；要批刘少奇，刘少奇就得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他要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敢等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呢？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那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的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的领导推动下，共产党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的资源，就是土地。这是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举动的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土地革命相当于让每



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在的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整个国民，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边无际。

这种威望是一把双刃剑，一面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边无际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 二、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的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墓碑》这本书。

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一个农民叫张三。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开始新的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

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就到田里帮帮丈夫。

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卖，换点零用钱。

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一家人就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换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炮火连天中的老爹以及老爹的老爹已经不错了。

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

现在三面红旗出现了，张三面临考验。

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得越多、越快、越好。

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当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她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听话多干点活也没啥。

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制造不出飞机大炮，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物。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的概念，叫代销店，里面出来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都没人愿意吃。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叫农村集市。

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形态。集市上的东西都是农民生产加工的。这种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只是已经不再纯粹。

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来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的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出去四五米远。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

集市上的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

那时候还没有养殖的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

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的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

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

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的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当时的轻工业水平跟不上，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的话，只有一种肉最可能吃到，那就是人肉。所以那年月落下许多吃人肉的记载。

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

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的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

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

为了祖国，为了超过英国佬，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

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十亩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加上牲口啥的，营养也不欠缺。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同志看到

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

如果张三同志还没死，将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

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干的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

如果足够倒霉，炼的钢不够，就要把自家的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的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的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腹中饥饿。

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

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该处的百姓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由农民出。

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帐。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干着一白眼，谁也分不清是累死还是饿死。

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大跃进时代独有。在某些地方，这种为了伟大祖国免费干工程的光辉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具体表现就是冬天修河道。

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

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然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加入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

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宰杀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就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不在充公之前吃掉？

实情是，在人民公社实施的过程中，导致了牲口的数量锐减。

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

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挤时间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

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副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

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的农家土菜不同，可不是为了清肠胃排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

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

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

经历如此之多的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吃了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得了瘟疫等等。

农民们以为政府会来赈灾救济。而在官吏眼中，一切却是另一个景象。

### 三、新五虎上将

前面说过，三面红旗来自毛泽东诗人化的脑袋。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头脑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胜利；到了建设年代，同样是毛泽东的脑袋，就想了，咱们在战场上可以打败对手，为啥不能在建设上战胜他们呢？当然可以啦。毛泽东又想了，咱们三年就搞定了抗美援朝，那么咱们应该需要多少年赶上美国呢？那就十年吧！应该谦虚一点啊。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时，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不管人家英美已经搞了几百年的建设。这还不过瘾，过了几天又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没人知道英国是啥样，却想着去超越它。大概是中国对鸦片战争的记忆过于深刻，所以一定要超过英国鬼子。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两年之后，在广袤的农村里大范围的农民，肥的变瘦，瘦的变肿，肿后非正常死亡。

战争年代，执行毛泽东天才思想的将帅中有几个人被称为五虎上将，就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功绩和毛泽东一起永垂青史，永享尊荣。如今毛泽东誓言搞建设，另有新的五虎上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毛泽东一起被写入历史，成为永远的耻辱。

请记住这新五虎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大饥荒把他们推到历史的风浪尖上。

老的五虎上将在战争中消灭了几百万敌人。新的五虎上将更猛，在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五省直接造成无数农民非正常死亡。这五个人在庐山都非常积极，争当毛泽东的马前卒。

话说五虎上将有啥特征呢？先说他们的共同特征：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在毛泽东的身边表现，建设时期成为一方诸侯狂热无比，不讲人格和尊严地追随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继承了庐山精神，毛泽东在庐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此五人在各自地盘里搞小庐山，整人无数，很多人前途尽毁，很多人家破人亡。

第三个特征，亲手推动大跃进，为了所谓的中央政策，对饿死千百万人民视而不见，堪比任何时代任何恶心的官僚。

第四个特征，文革期间被准确批判，文革之后被错误平反。

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论啥时候，他们都是大饥荒的象征性人物。

## 四、舒同在山东

舒同的书法家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

舒同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就是从“二王”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

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书法上，一代大师舒同先生的造诣罕有匹敌。

如果舒同先生仅仅是书法家舒同，他的名字将列于伟大的艺术家行列而受人敬仰。然而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书法家舒同还是舒同同志——山东省省委书记，封疆大吏。舒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好是大饥荒时代。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毛泽东好歹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然而舒同同志倒好，回到山东之后传达毛泽东的话，把那“一个指头的问题”给直接忽略掉。后来在批斗大会上，舒同同志竟然招供说，“怕给群众泼冷水”！群众都饿死了，泼点冷水说不定还能拯救一帮人。

在早期的领导人中，舒同算知识分子。按道理说，一个知识分子看问题应该全面一点，带来的灾难应该小点。可惜——舒同到山东之后，抓革命啊、开批斗会啊之类的都干了，大炼钢啊、修水利啊也干了，总之该干的都干了。这种事大家都在干，很难干出花样。舒同同志经过一翻努力之后还是干出了花样，知识分子的花样！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天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这是好事啊。当年大饥荒除了缺粮，就缺副食品。多种点菜就少饿死点人。

舒同回到山东，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奇怪的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给耽误了。这期间舒大知识分子干吗去了？既没有遭雷劈、也没有身体不爽。后来据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大知识分子和一个女护士搞暧昧！

舒同同志到青岛之后，除了参加必须参加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玩，就是带着护士



到外面玩。又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就这样将会议时间拖延了，饿死了一大批人。青岛会议结束后，舒大知识分子还不想回济南干活。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看看，这知识分子派头就是不一样。

另外一件能体现舒同同志知识分子身份的是放卫星。

说到放卫星，舒同和其他几位猛将还真不能比。比方说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可以在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舒同所在的山东省就没有这个技术。其他猛将放卫星，那是故意显摆。舒同放卫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先看看实例。

据舒同的孩子回忆：“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里，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看到了吗？根据这段回忆，舒同以为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就是说在放卫星这一技术项目里，舒同可能有点冤。

也就是说，他是知识分子，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志——傻气。所谓书生误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评：人生如此，纵是一代书法大师，也掩盖不了千秋罪过。

## 五、牛人张仲良

张仲良(1907年-1983年)，陕西耀县人，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一任领导人，专责管理青海地区。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之后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逝世。

甘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据说伟大的伏羲就是天水人。有了伏羲，中国文化就有了源头。秦帝国时置县，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一带纵横疆场。

甘肃地处大西北，环境艰难，加上和少数民族接壤，是中国最为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历来很难管。在封建王朝时代，中原王朝要么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要么受到东北少数民族的冲击。

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仲良成为第二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这里，他决定实行铁腕管理。

实事求是讲，在甘肃那一带，适当铁腕是对的。然而张仲良同志的铁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在铁腕这一技术环节有了创新。

凡是大跃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善于整风，也就说善于整人。风云人物张仲良是整人好手。通过张仲良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多人体验到了被斗争的“乐趣”。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整风报告中，张仲良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开展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无数人已经免费品尝过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还有无数人将要免费品尝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

精神惩罚包括反党啊、反国家啊、反人民啊、反社会主义啊、和老婆离婚啊、批判自家老爹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皮肉之苦包括开飞机啊、享受拳头啊这一类的。

由于需要整的人数量庞大，要大规模逮捕。

大逮捕有两个特色，一是株连：镇原县县长许国和成了反革命成员。根据株连原则，许国和的老婆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国和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大哥许

国福、二哥许国才(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连许国和 7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 6 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收留，幸存。

第二个特色叫肉体惩罚，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和许国和一起成为反革命的副县长张万寿同志成了典型代表。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 20 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张万寿戴上“骑马铐”。什么叫骑马铐呢，就是双手从裆下穿过铐起来，这样张万寿同志就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由于需要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业务过于庞大，必须培训业务技巧。工作组组长随身携带好盖了印章的逮捕证，需要时填上名字就可以了。由于这种方式方便快捷，可以批量生产，大大减轻了逮捕事业的压力。发现问题，随时开会，就地逮捕战利品。用麻绳把战利品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像奴隶一样。

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庐山事件之前。

张仲良同志不仅善于整人，还善于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学习。

张仲良同志准备大干一场，留下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当年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搞大工程修万里长城什么的，张仲良虽然只管理一个甘肃，气派却同样大。张仲良同志通过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等技术手段，决定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

陇中年降雨量平均不到 40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1400 多毫米，而这 400 毫米的降雨 70% 以上集中于 7、8、9 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基本是干涸的。

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洮河只能灌溉临洮县和岷县，其它地方非常缺水。陇中和陇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里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到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之前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盖多大房子，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张仲良同志决定改变这个情况。应该说作为封疆大吏有这种思想是好的。干好了将改变整个西北地区，堪与李冰在都江堰的功绩相媲美。然而问题就在于方式。

## 六、猛人吴芝圃

河南地处中原，处在中国的正中央。作为黄河文明的中心，河南有着特有的光辉，同时拥有数不尽的灾难。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光荣和灾难交替，河南也是这样。

自古以来，仁人志士们以中原为中心逐鹿天下，因此处在中原心脏地带的河南历来灾难重重。从当年武王伐纣开始，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有战争就总是少不了河南，有灾难也少不了河南。

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上，想要一统天下，必然要定鼎中原。国共争霸期间，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曾想遵循古习俗，实行中原逐鹿，并派遣刘邓大军试图问鼎中原，最后不成功才变成千里跃进大别山。击溃了国军的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一场“中原战役”。

战争结束了，但是灾难并未结束。因为河南迎来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一场人以为可以战胜老天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河南迎来了一位本地人，猛人吴芝圃同志。

吴芝圃

出生地： 河南杞县

出生日期： 1906 年 3 月

逝世日期： 1967 年 10 月 19 日

职业： 政治家

爱好： 念古书

性格： 强势

吴芝圃，河南人，新五虎上将中，就数他和毛泽东最相像。李井泉、张仲良等人足够铁腕，深谙政治斗争之道。但是吴芝圃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看书。吴芝圃酷爱古书，达到手不释卷的地步。这一点在那一代人中绝对是个异类。

和那一代人一样，年轻时代的吴芝圃怀着美好的梦想加入共产党，出生入死，算是精英。然而吴芝圃同志能在本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却因为他给新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后，身为河南人的吴芝圃衣锦还乡。

古人曾有人生四大喜之说，认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最为幸福的四件事。如果把四扩充一下，扩充到十，肯定有衣锦返故乡。

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而言，衣锦还乡对故乡和还乡者都是喜悦，双重喜悦。

然而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还乡，喜悦之后还是灾难。

吴芝圃原本只是河南省长，老二，由于强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获得了堪比孙大圣的火眼金睛的能力。吴芝圃同志利用这种超能力，在河南省一次性揪出七万右派分子！在那个知识分子贫乏的年代，河南知识界都不用文化大革命了。

当然咯，在那个年代，想要老二翻身当老大，少不了搞一个反革命集团。恰好老大潘汉年对大跃进有所保留，吴芝圃趁机来了一记连环脚，把潘汉年踹入反革命的大河中，一夜之间翻身当了主人。

好了，那就大大地折腾一场吧！

怎么折腾呢？既然张仲良已经在甘肃像秦始皇同志学习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跃进的旗帜性人物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就搞一搞吧。于是乎吴芝圃同志拿出伟大领袖十分之一的魄力，一年之内投入一千五百万劳动力，开凿的土方石相当于开凿了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在没有足够的技术设备支持下敢干这种工程，当然少不了画饼充饥，张仲良给贫瘠的甘肃画了一个饼，吴芝圃同样来了一个。

干到尽兴时，吴芝圃那贫瘠的脑袋里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整个河南省水库和运河交叉相连，如同长藤结瓜。河流是藤，水库是瓜，河南将永远远离水旱灾，实现旱涝保收，一劳永逸！千秋万代之功由他吴芝圃来完成，多么伟大呵！

事实上呢？那些烂尾工程就不提了。由于吴芝圃先生把异想天开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平原上开挖人工运河，强行引入黄河水灌溉，造成上百万亩土地盐碱化，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知道为啥自然灾害了吧？人为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这么一层，自然的福祉人不可以强造，但是自然的灾害可以直接引入。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用自己发热的脑袋做了示范。

这些水利工程，有一部分确实非常有利，一直有利到现在。这部分值得表扬。问题是还有一部分相当有害，一直有害到现在。

标志性的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渭水时不时倒灌渭南平原，灾难无数。

说到水库当然不能忘了板桥水库。这个水库修在五六年，加固的，防洪，但排洪效果一般。当

年水库都是这个指导思想，防洪轻排，就像领导重面子轻功效一样。七五年大雨，板桥水库垮了，接下来引起几十座水库溃决，将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淹没，上百万人逃荒。

吴芝圃同志的另外一大贡献是放卫星。

在放卫星这一高技术栏目里，吴先生拥有优先发明使用权。为啥要放卫星呢？五六年苏联搞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压倒了美国，卫星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咱们也想搞个卫星玩玩，但是咱们那时代还没有那个技术。

于是爱国心切的人们就想了，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让土地来长卫星吧。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省做了创造性的发明。

第一个卫星来自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当年河南那地方，小麦亩产也就两三百斤。

那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相信奇迹的时代。这样一个没有袁隆平的时代，亩产一下子提高十倍，也没有人怀疑，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天真的年代啊！

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国度里，当第一个奇迹涌现的时候，奇迹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遂平县嵒岈山公社，公社有个韩楼大队。大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种了三亩试验田，小麦长得不错。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叫到大队部开一个紧急会议。

钟德清：“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领导发话，鼓励在先。

陈世俊：“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

钟德清：“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钟德清再次鼓励：“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已经暗示造假。

曹玉娥：“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

钟德清：“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即将从暗示到明示。

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

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终于变成了明示！早就想好这么干了，就是不说。领导就是高明啊，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推脱责任。

曹玉娥：“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

《人民日报》背后那些没真没假的傻瓜写道：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就是这么练成的。

卫星释放之后，吴芝圃的省委班子作秀了，搞了一个丰年博览会，还请了周恩来参观。周恩来照例说了一系列鼓励的话。

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小麦七千多斤，鸡公山水稻亩产四万八。懒得解释了，稍微动点脑子都知道不可能。吴芝圃就这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有人对卫星怀疑吗？当然有咯。那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说谎。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因为那些实实在在的人的存在，谎言才有意义。

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发扬民主精神，搞辩论。《墓碑》里引用过当地工作者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嵯峨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这是农业卫星，虽然吹牛但不影响生产，破坏力度和钢铁卫星根本不能比。

钢铁大元帅吴芝圃同志坐镇钢铁元帅帐内，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命令把所有钢铁、包括各家做饭的铁锅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炼钢燃料。

谁敢不听话，钢铁大元帅有办法整治：捆、绑、吊、打等常规必备；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 10 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逃避这些霹雳手段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去自杀吧，有上吊、喝药、投水等办法可供选择。

下层人士如此，上层人物也不可避免。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有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尽管如此，发疯的王慧智站在历史耻辱柱的对面，眼睁睁地看着正常的吴芝圃。

吴芝圃同志骄傲地宣称，全省有 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各种冶炼炉 22 万余座。10 月 11 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然而恶果导致五八年秋收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这些粮食可以挽救百万人性命。

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一部分官僚“牛气冲天”，不仅把百姓折腾到生不如死，连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点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牛啊！当然吴芝圃还是有后台的。他把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点意见，也是就地挨批，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多学生到河南，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事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吴芝圃同志就用这种办法把河南老乡折腾死掉千千万万。那些没有饿死的人中间，很多人是吃人肉活下来的，还有人吃自家亲人的肉才活下来

关于吴芝圃的评价，引用吴芝圃本人的话：“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

——然也。

在自我评价这点上，吴芝圃同志的古书没有白念，自身定位准确。



## 七、狠人李井泉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相扼，东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枕云贵高原，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

那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蜀文明，李白在高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时曾经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接下来又有神秘独特的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文明的早期代表。

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汉末三国时为蜀国地。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初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合称“川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分峡西路为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后改益州路为成都府路，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分利州路为利州东、西路。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定省会为成都市。

在这长长的演变史中，四川名人无数，既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又有杨玉环那样的美女。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占了将近一半。

众多名人中间，今天说的这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的前半生是光辉的半生、革命的半生、有理想的半生，他的后半生则是相反。特别是大跃进时代，李井泉跌入了深渊。

吴芝圃已经很猛了，他的伟大功绩足以光照史册。然而他并不孤单，在五大高手之中只能名列第二位。在同时代的高手之中，他还要仰望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绝世高手。

他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井泉同志。

五虎上将之中，李井泉的战斗力和战绩最大！

正是李井泉同志的超强能力，使得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人间地狱。这个数字多大，本人没有推算过。但是在其他人那里都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足够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集体泪流满面，因为这二十人中任何一人纵横战场几十年，总共消灭的敌人大概都没有这个数。

身为五大高手中的绝顶高手，李井泉同志熟悉大跃进时代所有的技术手段，在每一项的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井泉同志的手段。

李井泉的第一项手段，放卫星。

放卫星这项杀人高科技武器虽然不是李井泉同志的发明，但是应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的却是李井泉。比起吴芝圃同志干巴巴的卫星策略，李井泉同志更有创造力，改进了放卫星的技术手段，使之达到巅峰。

五八年三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开会。这里是李井泉的地盘，李井泉当然要在此以无微不至的方式表达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

三月五号，毛泽东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是康熙年间重建，大部分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一句话就让成都市的城墙当即全部拆除。

毛泽东又发现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很多。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耽误干活，流露出一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这只不过是铺垫。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去了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低头进了一件茅屋。毛泽东问房子主人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作了回答。伟大领袖满意之下却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

都说李井泉是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忠诚也就是绝对欺骗。

毛泽东走后，当天晚上下大雨。成都春雨本身是正常现象，然而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这马屁拍得，就一个字——高！

据作家东夫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

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明，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七月底，第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从红光社升起来了。李井泉的喉舌报纸——《四川日报》添油加醋地报道，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马屁的极限），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它长出好庄稼，才出产这颗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得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来的鲜花。

这世道，除了无语还能怎样？

卫星一颗接一颗，一颗比一颗大。

到了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终于在高产卫星上首次夺取全国冠军。

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有如此功夫，舒同、张仲良、吴芝圃之流又算啥？正是凭借这一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升为中央委员，成为坐镇一方的中央大员。当年高岗在东北也就这待遇。与此同时，四川同胞却一步步陷入绝境。

当然咯，五虎上将都有两手，放卫星同时不忘大炼钢。

身为五虎上将之首，李井泉同志炼钢也极有特色：选择一个山坳，把树木砍光放在下面，收集来的锅碗瓢盆等等直接放在上面点火烧，烧出来大堆大堆黑糊糊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有啥用。

那个时代，官僚们通过两手把百姓赶入绝境。卫星放一放，中央把粮食征走一大半；钢铁炼一炼，耽误一部分收粮。广大老百姓就相当于进入绝境的野兽，等着饿死了。

但是李井泉同志还有另外一招狠手：调粮。

四川一直都向外调粮，而且数量可观。然而经过李井泉同志一番折腾之后，粮食已经不够吃了，这时候伟大的李井泉同志为了伟大的啥精神，勒紧裤腰带玩外调，运更多粮食。由于李井泉同志大

公无私，四川人的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五八年还有 512 斤，到五九年只剩下 278 斤，六零年只剩下 260 斤。这些理论上的人均粮，除去种子和各级领导多占的，每个人每天也就半斤左右。

这半斤口粮也不能合理分配，一段时间大吃大喝，大炼钢浪费的，还有分配不公的，七去八折腾就要缺粮。试举一例：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 岁，于 1960 年 4 月 23 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 岁），儿（李永安，9 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两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缺粮之后吃啥呢？野菜野草那是美味佳肴，树皮树叶也是家常菜。

当然人肉是少不了的一道菜。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1960 年 3 月 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篋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售卖，共卖了 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 16 日下午，她把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这些都吃了之后，还有一种东西入肚——观音土。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咋一看像面粉，但它不是食物，连动物都不吃，但是饥民会吃。

饥民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吃过之后肚胀腹痛排便难，轻者犯病，重者丧命。

对待这些饥民——饿死的和将要饿死的——四川省统一口径说是一种流行疾病。为了消除这样的疾病，就搞了一种消除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病者送入临时医院，因为缺少药品（粮食），就用盐水代替，病人继续生病，并没有因为爱国卫生运动好转。

李井泉同志因为调粮有功，四川的盖子一直捂着，一直捂到六二年，别的省份饥荒都已经过去了，四川还在饿死人。五虎上将之首，当之无愧呵。

调粮的责任不能全算在李井泉的头上，当时的高层领导毛、刘、周、邓都有责任。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打电话，邓小平亲自去四川。这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能看出来，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在专门召开的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领导们的力保，并不能减轻李井泉的罪恶。

历史只会记得，李井泉同志忠于领导，李井泉同志只懂得忠于上级，李井泉同志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正是在李井泉同志统治下的四川饿死了无数人。不要相信李井泉同志的眼泪云云，他是封疆大吏，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于这种级别的人，历史只会记下其功劳或罪恶。

李井泉因为极其痴愚地执行所谓的中央政策，他得以稳坐高官，避免了提前下台，同时避免了四川饥饿早日结束。

## 八、能人曾希圣

安徽是个好地方，去过黄山的人都这么说。不仅是现在，即使在古代，四大西湖中，就有颍州西湖，当年和杭州西湖齐名，欧阳修在颍州当太守那会，日日沉醉于西湖美景，留下许多佳作让现代高中生头大。遗憾的是颍州西湖如今已不在。

再往上追溯到东周时代，安庆那个地方就已经建国，曰古皖国。皖，即美好之意，因此安徽简称皖。然而安徽建省比较晚。清康熙六年，从原江南省的安庆府、徽州府各取两个首字，简称为“安徽”，首府定于安庆，安徽地名由此出。

安徽省这个名字出现得虽然很晚，但是这个土地上的灾难却不少。最近的一次灾难就是大饥荒。

制造者，曾希圣。

在五虎大将里，曾希圣的成绩肯定赶不上李井泉和吴芝圃，最多排名第三位。之所以把他放在最后一个来讲，是因为这个人很特殊。特殊在哪了呢？就是这个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他人干的事，曾希圣一样没少干。首先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把张凯帆打成反党人物，送到淮北煤矿，让他在祖国的挖煤事业上发光发热。从此安徽省委成为曾希圣的一言堂。随后曾大官人开始大干特干了。

前面已经介绍了几位高人，把能折腾死百姓的方法使用得差不多了。写到这个第五位，已经很难写出新花样。然而历史常常证明，人类的脑袋没有极限，只要想干，总能干出新花样。在曾希圣的光辉领导下，安徽省内仍然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做法：把小麦改为水稻。

安徽省主要有三个部分，皖南山区风景秀丽（黄山所在地）、中部丘陵和北部平原。水稻一般种植在皖南和淮河两岸，有些地方不能种水稻，土地渗水厉害。曾大官人不管这些，他要多种水稻。

五八年，凤阳改水稻一千六百亩，平均亩产五十多斤，种子都没收回来。这么低的产量当然是拿不出手的，那就放一放卫星吧，结果很明显，饿死人。

为了强制性种水稻，田里无水也要插秧。

改水稻只是插曲，还是说说曾大官人的本职工作吧。

放卫星那啥的就不说了，亩产四万斤，就算比不了李井泉，和其他猛人相比毫不逊色。中央征粮，粮食不够，饿死农民。

炼钢也不少，废品成功率很高，耽误了农时，饿死农民。

建设新农村，强行拆迁无数房屋，饿死、冻死、打死农民。

大规模搞水利建设，没有饿死的累死。

为了保护卫星、钢材和拆迁，各种刑罚一一现身，具体情况请参照前文。死在刑罚下的百姓不计其数。例如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同志，17岁，有一个7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2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天不让7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23人，骂了60多人。整个生产队也就一百多号人。不禁感慨，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生产队长比监狱长都幸福。

生产队长只是所有官僚团队中最小的一级，比九品芝麻官还小。

比九品芝麻官大一点的官僚呢？根据《墓碑》记载：

1960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13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12个菜，中午24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59年冬60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1960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不闻不问，

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1960年7月到11月，只在食堂吃过6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其中7人被他们奸污。

这就是当年凤阳县的情形。凤阳县是当时饿死人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年凤阳人口不到四十万，三年饿死九万人，接近四分之一。

安徽北部，吃人肉成了一种流行。有人偷偷吃野外尸体。有人自家亲人死后藏起来吃掉。有人干脆去把死尸挖出来。当然咯，这种情况是给党和国家抹黑的。既然给党和国家抹黑，那就要批斗是吧？

《墓碑》里记载了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情况：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吃多了，形成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这是曾希圣统治下的安徽，六零年之前的安徽，和其它省份并无区别。

曾希圣在安徽分成两个阶段，以六零年为分界。面对惨绝人寰的灾难，曾希圣终于想到改变。怎么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地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种，一切就解决了，但是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勇气了。

彭德怀在庐山也就是写了封信而已，结果就自己种田了，曾希圣同志虽然也参加过革命战争，但吨位和彭德怀相比差远了，一旦形势需要，中央将毫不犹豫地拿下他。事情到了六零年，已经没有人能救他，所以他只能自己救自己。

曾希圣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包产到户，饥荒停止。

——此时的曾希圣可谓吃了熊心豹胆，勇气逆天。

刘少奇没敢干的事他干了，周恩来没敢干的事他干了，邓小平没敢干的事他干了，甚至连彭德怀不敢提的事他都干了。

干得好，漂亮！

促使曾希圣分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同志们的盖子捂不住了。六零年山东猛人舒同落马，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两省父母官。然而曾大官人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纸终究包不住火。舒同的今天就是曾希圣的明天。

不改变，也就是多撑一两年，同样将灰溜溜地倒台，身败名裂。

联系到张仲良和吴芝圃等人的遭遇，曾希圣准确地预测到自己的明天。在他这个级别的人，拿下之后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曾大官人需要改变，改变一个叱咤风云人物在那个时代注定的命运。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饥荒的惨状，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视而不见。和毛泽东战战兢兢地看着全国大饥荒一样，曾希圣也在战战兢兢地看着安徽省的大饥荒。搞笑的是，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敢于把田地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不论如何，曾希圣的行动值得赞赏，如果没有那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安徽至少多饿死很多人。

尽管曾希圣最后还是落马了，而且再也未能复起。然而他为那个时代进入死角的经济政策找到了出路。比起哭哭啼啼的吴之圃，比起一条路走到黑的李井泉，已经相当难得了。

评：新五虎上将中的曾希圣，虽然也有狠人、猛人、牛人之特征，但是他属于另外一种人——

能人。

## 九、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写了这几个人之后，笔者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没有发生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的那些运动。

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它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的根源。

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之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我们上千年的难题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出了问题找他来扛也是一个选择，反正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也不能把咱们怎么着，对吧？既然战争年代，很多功劳可以一股脑算到最高领袖的头上，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灾难也可以完全算在他身上。现在我们谈到大饥荒，大家一哄而上，喷点口水了事，好像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痛快归痛快，一时的，仅此而已。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很简单。

然而这么做，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因为这本就不是最高领袖一个人的事。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毛泽东本人。

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领袖和官吏之间的关系问题，说白了就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那是相当古老啊！

从史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着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们之间的角力了，这里就不细究了。

下面言归正传，看看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德怀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也一言九鼎，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

这几个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毛泽东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

这事要从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上说起。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除了政策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一用人。在用人这个方面，蒋介石喜欢指指点点，而毛泽东则放手让部下去干。以三大战役为例，蒋介石天天在战术层面上指手画脚，而毛泽东则是在制定完战略之后让林彪、粟裕等人放手去干。

由于这段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功，所以各路专家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的用人方式猛夸，说什么用人不疑啦、充分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啦等等。当然大家的称赞是对的。

然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风格从来没有改变，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只不过战争年代的将帅们交出的成绩单是彻底消灭敌人，新五虎上将的成绩单是人口急剧减少而已。

因此说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全部所做作为那是瞎扯淡。毛泽东也不是神，也不是坐在中南海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事，也不是坐列车转一圈就能了解一切。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周恩来亲自去参观，周恩来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德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

当时的毛泽东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德怀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的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了毛泽东。他们欺骗过毛泽东么？有过。

在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毛泽东曾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就是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讲全部是成绩，没有缺点。毛泽东从来不会把话说死，不会把事情做绝。如果毛泽东是一个常常把话说绝，事做绝的人，那么毛泽东就不会是今天的毛泽东了，这里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做事总留点余地，不管是批判人还是搞运动，都留有余地，一步步来。批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也不是一棍打死，搞文革酝酿了好几年，而且均留有后路。舒同在山东那么个搞法，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和他本人推向绝路。

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就平反了。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的概率并不高。这么平反，无非告诉大家，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毛泽东。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法计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毛泽东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

最为有趣的大概就是吴芝圃了。本来是大兵转业当干部，读了几本古书就搞技术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毛泽东。吴芝圃之所以称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芝圃同志希望实行机械化。一听好事啊，然而吴之圃同志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好事，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在现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当时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的这种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毛泽东很高兴，表扬了吴芝圃同志。吴芝圃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不是因为这些玩意有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的家伙。它们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使用，也就是说专门欺骗领袖用的。

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新玩意。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

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日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毛泽东说当时上了史向生的当。

其实是上了吴芝圃的当。

李井泉同志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一套的。前面我们说过深翻土，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开展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特别……我找不到形容词了。

这么干，后果很严重。想一想吧，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能种多少地？可能是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行，就是说张三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不到了。

这样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

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械化”。

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靠！

这些精英确实不同程度地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样说不通。

舒同和吴芝圃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时代，他们这种文化人相当难得。如果做一个对比，他们两位比当今的博士生还要珍贵。不妨派两个博士穿越回当年接替他们的位置，会干得更好？未必！

如果说文化人不够说服力，那么看看曾希圣的简历。曾希圣出身书香门第（学前教育不少），除了正规文化教育之外，还念过黄埔军校（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校），留学过苏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搞过特科……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谓千锤百炼，任何时代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杰。再看李井泉，他在南昌起义那会就想办法拉队伍了，那时才十八岁而已。今天十八岁的年轻人想过“创业”这两个字么？

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均在青年时代有理想，为了理想而奋斗。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后生，用实际行动为伟大的信念而奋斗。曾希圣这种人，即使不去干革命依然衣食无忧，然而他们都选择了实践信念。当险恶的人生到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面对。同志们一批接一批倒下，他们像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就继续奋斗了。经过残酷的历练，他们有幸存活下来，到新中国建立，成为封疆大吏。

回顾五虎们的一生，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同样为了理想而奋斗，同样出生入死，同样相信共产主义，同样相信领袖毛泽东，他们愿意故意欺骗毛泽东么？不愿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欺骗了毛泽东，有人无意、有人故意。

换个角度来看，五虎上将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虽然在邓小平等人的保护下过关，最终没能逃脱惩罚。政治生命结束不说，在后来的运动中也享受到特殊照顾，充分品尝了大跃进时代他们强加给对手的苦果。以五虎上将之首的李井泉为例，在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性李井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没有一个人保他，好在李井泉打过游击，东躲西藏活了下来。然而他闯的祸却连累家人。夫人肖里的头发被全部拔光，注意这个字眼，是拔，最后肖里不堪忍受，奋而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据说当时没有完全咽气就被塞进焚尸炉。因果轮回，报应何其之快。当然咯，按照人道主义的立场，报应不应该发生在家人那里，应该是李井泉本人。

李井泉在以后的日子里，闭口不谈大饥荒，为何？因为李井泉想为某些人掩饰？不对。如果是

为毛泽东掩饰，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已经不那么重要，泼点脏水也无所谓，不是有三分过错么？盛得下李井泉那几漂！为刘邓掩饰？这个有可能。然而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辉完美的形象，李井泉犯不着为了某个人把自己留着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的观点是，李井泉之所以不说话，只因为无话可说。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无条件服从组织意见。军人转变成封疆大吏，他依然无条件服从组织意见。虽然他知道下情严重，也许内心很痛苦，依然选择无条件服从组织。他的一生为组织而生，视组织为宗教信仰，自然不会把脏水泼到组织上。基督教徒会把脏水泼给基督教么？所以他无话可说，有多少矛盾或者痛苦，都一肩挑了。

为啥会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

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在大饥荒期间，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政治明星之一。吴芝圃之所以闪亮，是因为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最早实行大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它省份起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

河南省之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就来看看如何典型。

当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成为信阳地委书记。信阳成为新中国的伤疤。

按照一般的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的江洋大盗之类的，也得是戏剧脸谱中的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查，食堂多做了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

但也不要以为路宪文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那个时代不允许两袖清风的官吏。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泽东。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毛泽东，路宪文则欺骗了自己的偶像吴芝圃。

身为当年信阳的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的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形象代言人。

作为吴芝圃的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通过一系列超强的执行能力把信阳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饿死的。

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路宪文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

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

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

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热火的那段时间，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都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的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得到解脱。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

饿死人的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信阳被揭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结遭殃了。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 8000 多人，特别集训 5000 多人，斗争和批判了 10000 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 983 人，逮捕法办的 275 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衡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严重的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参与了进去。高层的政策失误是高层的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的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的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的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多吃多拿，老百姓饿死无所谓。

站在时代的悲剧面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宗教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在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

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把你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你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

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自下都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放在后面的篇章里讨论。现在讨论一下责任问题。

## 十、毛泽东的责任

这里讨论责任，并非为了追究啥，也没有人能追究到啥。这里讨论责任，只是看看能不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在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大饥荒，是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中第一次的战略失误。

先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原因。

长期以来，大饥荒的原因，对外宣称自然灾害，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困难。确实，那三年发生不少自然灾害。比方说信阳地区，六零年就旱灾严重。其它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灾、旱灾，都是事实。但是自然灾害并非主因，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大的缺口。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逼债，主要是贷款以及朝鲜战争的装备费用。这个也是原因，还不如自然灾害有说服力。

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失误，这在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所谓政策失误，也就是三面红旗的失误，三面红旗的真正旗手恰好就是毛泽东。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要说责任，第一个肯定要说毛泽东。

说得更明白一点，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饥荒中，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

所谓领袖之责，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也是最为浅显的一层，就是用人问题。

在用人这一层面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得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战争时代与建设时代，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一脉相承、一成不变；另一个结果，就是新五虎上将中的每一个人都欺骗过毛泽东，而且是原则性的欺骗。

通过这两个结果，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对象问题。

其实在战争年代，那些将帅们也违拗过毛泽东，像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像林彪在东北撤出四平，像粟裕对淮海战役的构思。这些事虽然和欺骗联系不到一起，却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新的五虎上将的所谓欺骗，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然而战争年代的斗争对象是敌人；建设时代的对象则是百姓。敌人和百姓，一词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毛泽东放手用人，在传统意义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好的，战争期间取得了可喜的结果，这是好事。然而建设和战争是两个概念。战争中，不管用啥办法，只要最后把敌人给弄死、

弄伤、弄残、弄服气，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建设则是另一个概念，只有一种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正若要拆掉一座房子，有无数种方法，炸药、推土机或者超人的拳头都能用；要建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地基，再一砖一瓦地去弄，只能由下往上盖，无法反过来，是吗？

在战争年代，领袖要做的就是发动各路人马放手去干。在和平年代，领袖任务应该变了，那就是约束手下的各路诸侯，使之不得胡作非为。因为在战争年代，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可以推给敌人。在和平时代，再没有敌人替你挡脏水，功劳和错误都要自己扛下来。

局势变了，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没变，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错误。为啥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就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毛泽东的第二个错误。

所谓政策错误，就是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详情请参照本篇开始的那一段。

所有错误均有思想来源，然而思想本无所谓对错。要挖掘，只能挖掘错误在思想中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左倾思想的来源以及它的积极性和危害性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有点大，放在这里不合适，只能留到最后的毛泽东篇章里叙述了，还望看官们包涵一下。

顺便多说几句。毛泽东在当今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论说什么总能惹起一部分人不爽。爱他之人爱得要死，容不下半点贬损，最多就是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也有那么一丁点错误。至于错在何处，则不予评说，好像要冒犯神灵一般。个人观点，本着实事求是（毛泽东说过最多的成语）的原则，既然说一个人有错，就应该说出这个人错在哪里，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借鉴。如果只是笼统说几分功过而不说过在何方，那才是污蔑，才是对伟人的不敬。

另一部分人恰好相反，恨毛泽东恨到骨髓里，听不得关于毛泽东的半句好话。非得把毛泽东说成疯子或神经病才觉得解气。不知道他们为何痛恨毛泽东。痛恨归痛恨，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要知道毛泽东被骂得最狠的年代可不是现在，而是建国之前，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把毛泽东描绘成不堪的怪物。那样的情况下都没能损害得了毛泽东，现在骂几句有啥用？如果真的痛恨毛泽东，就去寻找毛泽东的弱点吧，就去提高自己吧，就去为自己（小的方面）为国家民族（有点大呵）多干点事吧。疯狂谩骂，对另一个世界的毛泽东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影响这世界对毛泽东的评价；反而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何苦呢？

毛泽东是个伟人，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在任何时代用任何一个观点来衡量，都有正反两种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站在任何立场上看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功有过。如果想要从伟人身上吸收点营养、得到点启发，那就用自己的观点去唠叨伟人的功劳和伟人的过错。看看伟人的成功方式，咱们能否借鉴一点；看看伟人身上的缺陷，

咱们自己是否也沾了一点。

一句话，咱要对伟人理解并尊重。

唉，有点离题了，咱们继续。

## 十一、领导责任：刘、周、邓

领袖责任被毛泽东扛走了，剩下的领导责任也该有人分担吧？新的五虎上将纵然有大过错，然而他们只是省部级干部，最多只能祸害一个省。在他们和毛泽东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央领导层。这个中央领导层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

同样的重大事件，中央对文革定性明确，即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是对大饥荒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用三年自然灾害做掩饰，然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事实上大饥荒也差不多，也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打倒了不少有话语权的人，他们需要有个交代。交代有了，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在作怪。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大家可以说，恶人受到惩罚，正义战胜邪恶，真理得到肯定。

大饥荒则是另外一回事。大饥荒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是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败，也是参与决策和决策执行者的失败。

参与决策的是谁？很明显，就是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几个人，执行决策的也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恰好都是光辉形象，要维持的。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基本政策处于转型期，意识形态还没怎么转变过来，国家还不是很富裕，老百姓还不怎么思考问题，需要一些完美形象来团结人心。

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国家更加富裕，咱们老百姓的认知水平也已经大幅度提高，不会因为一些伟大人物曾经的失误跑去和政府对着干。因此，咱需要更为仔细地审视那些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无完人，光辉的周恩来总理也不完美，这个他自己也承认。

邓总设计师自我评价的时候也是有功有过。其中的过失也包括参与了大跃进吧。

刘少奇曾经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认为其中一层含义就是人民写历史的时候也会分析每个人的功过得失，然后再根据这些功过得失选择今后的路。

当时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

在大饥荒时期，他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是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

二， 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

三， 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

四， 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

说真的，中国的国家元首的概念和其它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法比，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就是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刘少奇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

咱们中国的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于领导的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刘少奇是二把手，第二高。毛泽东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由二把手刘少奇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刘少奇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

毛泽东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在大饥荒时期，大方向还是由毛泽东来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毛泽东的事情很多，他要关心其它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不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

这么说吧，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大饥荒。在大饥荒中，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的灾情最严重，其它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毛泽东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的政策，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

这个失衡，除了刘少奇领导的过失，就是周恩来了。我们知道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挨过批，街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

国务院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其权利如下：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周恩来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任的一生。他很好地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的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在那种极左的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当时的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的成员。后来邓小平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个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

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选择和毛泽东保持距离，跟着刘少奇的路子走。于是才有了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

其他实力派如彭真、陈云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

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毛泽东负领袖之责，刘少奇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过错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过错则是瞒下欺上，而基层官吏的主要过错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老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

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很苦。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

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新中国之后的农民和之前的王朝时代的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在新政府中，他们分到了一块土地。要知道中国当年可是一穷二白，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举国上下全部的家当基本上就是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家当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国民空前团结，所以人气空前高涨。



当大家怀着感恩的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静下来想一想那三个字: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然而我要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思考过,只有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们悲伤的面孔和愤怒的眼神。

从老百姓中走出来的精英,回过头来想办法统治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懂得思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大饥荒时代的老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感恩,他们开心,他们高兴,他们把中央和毛主席当成伟大救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私自利的表现。比方说吧,大饥荒时期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副食品和家禽牲畜匮乏。而家禽牲畜匮乏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加入公社之前宰杀了自己的牲畜。有人为了口腹之欲,有人仅仅是不想它们落入“公家”而已。

我们不能也不想责怪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新中国。这里我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身上,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没有重新崛起的民族意识,一切都是瞎扯。但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在“公民智慧”这一块,还处在开启的前夜。而咱们今天的老百姓,公民智慧这一块进步了不少,然而民族意识却在减弱。什么谩骂、地域攻击、人身污蔑等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飞向社会各个角落。仿佛大家来自敌对的国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这样会有啥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分裂而已。纵观整个历史,咱这个国家唯一惧怕的就是不团结。

在我们说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国家主席应该负怎样的责任,总理应该负怎样的责任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民众素质这个基本问题。我并非拿这个问题为谁开脱责任,这里只想指出,当我们渴望法制、渴望民主自由、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时,这些并非一蹴而就,不是一天半会就能实现,而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取决于民众素质的积累。

所谓民众素质,也就是勤于思考而已,多问点为啥而已,遵守各种秩序而已,待人文明礼貌一点而已,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而已,等等而已。

当我们回头看那段悲惨往事,发现那些因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狂热却不懂得思考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相对于他们,今天作为老百姓的我们已经懂得思考许多问题,同时还需要思考更多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更进一步的改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都是人杰。按战略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上,毛泽东也不差;按实际办事能力,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排得上号。更为难得的是像他们这等人杰,都是脚踏实地工作,不论身在草野还是高居庙堂,基本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在他们那里可没有咱们今天这种一天上班八小时的概念,连续工作几天都是正常现象,常常免费加班到午夜。

他们都想按照一个模式改造百姓。很不幸,他们失去了那个度。

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大饥荒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灾难如此严重，为何没有人再次起来造反、闹革命？整个一部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有造反的痕迹。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秀全，从来不缺少农民起义造反。甚至在红军时代，各个根据地的建设，也可以看成是农民起义。大饥荒时代，灾情同样严重，为啥就没有农民起义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申明一下，当初也有一些人试图“造反”，只是数量很少，可以忽略。

更为好笑的是，竟然有人试图拿这个——没人造反——来证明当时政策没有问题，人间天堂。既然那么不堪，为啥没有人起来造反呢，要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造反的了。关于造反，可以列出一大堆的事例数据，不仅是末世王朝才有人造反，即使是盛世，如康熙王朝；即使是开国之君，如朱元璋的时候，均有农民起义造反。在新中国，基本上没有人民起义造反，所以一直很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好，推敲起来相当有问题。

很多仁人志士对此给予了驳斥，归纳起来如下几个方面。

一个观点是共产党控制太严密，大家没有造反的机会。

当时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各级行政工作也到位，还有民兵。而且共产党领导都是靠造反起家的，对付造反很有经验。然而这些最多只能说明造反困难，难以成功，绝不是禁止造反的理由。同时也不要那些控制想象得天衣无缝，哪个时代的农民起义是被放任的？

另一个观点是，当时大家都饿得不行了，没有力气去造反。

要驳斥这一点也很容易，如果不挨饿鬼才去造反哩！见过哪一次的农民起义是吃饱了撑得不行去造反的？没有吧。除非精神病，谁吃饱了去干那种高危事业啊？！吃饱穿暖之后思淫欲去了，造反？还是等饿了再说吧。

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新颖，就是当年的农民百姓有负罪感。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些农民本来是没有土地的，他们的土地都是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在夺得土地的过程中，他们对待地主没有客气。在他们淳朴的内心中，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觉得做了亏心事应有此报。这种观念的人很少。对于这种观念，我只能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农民当年就不会去搞革命了，对不对？

这几个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仔细分析一下，似乎都不那么严密，好像还缺了点啥。此前我一直想了很久也没能弄明白。直到春节回老家过年，似乎有点头绪了。把所见所想纪录下来，供看官们借鉴参考。

## 十二、春节见闻录

本人虽然是乡下人，因为年龄的关系，对大饥荒并无体验。只是童年在乡下常常听到六零年饿死人的传说，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接触到大饥荒的资料时觉得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以如此严重呢？！直到写这个篇章之前，我还是不太相信，不仅对大饥荒想不通，就连之后的各种运动也想不通。看现在留下的那些资料，大饥荒之后就一直在搞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运动如此惨烈残酷，为何国家还能稳定？不仅稳定，还能在搞金门炮战，还能发动对印度边界的战争，还能搞两弹一星，还能研究胰岛素，为啥？岂不怪事？！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折腾出这样的怪事。

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

恰好春节回老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饥荒的机会。毕竟大饥荒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五十多岁的人就记得当年的情形。春节大家都在家，也不需要什么记者采访那般繁琐，以串门聊天的方式闲话一下就可以，比专门的采访调查方便多了。

我询问的第一个对象是爷爷和奶奶。爷爷的一个哥哥在六零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奶奶的娘家在邻村，也有一个侄子饿死。大饥荒年代，爷爷差一点也饿趴下了。奶奶在公共食堂做饭，虽然没有办法多吃多占，但是自己的那一份少不了。奶奶每一次吃一半，另一半带回来给爷爷吃。所以爷爷的处境比其它人好点。据奶奶描述，那几年收了粮食要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大家够吃几个月，然后杂粮拌草根再吃几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粮食短缺。

我问他们：那你们恨毛泽东么？爷爷没听清楚：啥？我大声说，你们恨毛主席么？奶奶听了之后“瞪”了我一眼。那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呢？！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通常的情况下，只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时候，奶奶才会这般“瞪”我。每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毛泽东，他们的情绪都会为之一变。

本村一个叔叔，比我老爸大十几岁，在大饥荒的时候，只有十岁左右。他有两次差一点饿死了。之所以没死掉，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个地方藏了一点黄豆。偷偷抄了一小把，吃了之后就还魂了。另外一次真的快不行了，恰好斜对面一位寡妇向他招手让他过去，他将信将疑到寡妇家。寡妇拿出一个馍馍头给他吃。啥馍馍呢，既不是麦面也不是米面更不是五谷杂粮，而是一种草。说起来各位也许不知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种草叶子比较厚实，边有刺，牲口都不吃的。寡妇就把那种草房子放在石头上倒碎，蒸熟，像宝贝一样。

我问叔叔：你恨毛泽东吗？

叔叔说：那跟毛主席没关系。

我说：你都快饿死了，怎么不恨呢？

叔叔说：那是下面人耍种，毛主席干着一心想为百姓好。要不是毛主席，俺们现在哪来地种？我和你爸现在还在给地主打长工哩。你也没机会上大学，也没办法在这说长道短。

一位婶婶他的娘家离我们村比较远，大饥荒那会他还没有出嫁。她说她当时都已经饿昏死过去了，她妈妈不知道从哪里一位好心人那里弄到一把麦面，活成面糊糊，灌到嘴里，然后就活过来了。要说没那把面，她就要去见饿死的亲人了。

我问婶婶：你恨毛泽东吗？

婶婶说：那不怪毛主席。他没有上台。婶婶说的没有上台是指当时毛泽东不是国家主席。

我说：政策是他制定的啊？

婶婶说：那是别人（把政策）弄坏了。毛主席为百姓好。要不文化大革命那会毛主席准许老百姓斗当官的干啥？那会饿死人的人后来都没得好报。做人还是得讲良心的。

婶婶说了他们的村干部，粮食不给老百姓吃，自家人却养得白白胖胖。后来文革，老百姓把他们绑在村子的大槐树上，每个人去刮鼻子（乡下是一种侮辱），可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坚硬的树皮啥的，把鼻子上面的皮全给刮了下来，血淋淋的，很吓人。

邻村，也就是奶奶娘家的那个村子，有一个老人叫歪嘴。他打过朝鲜战争，一颗子弹从嘴里穿腮而过，说话时嘴老往一边歪。他身上的军人气质早已消磨干净，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那年代对战士还是蛮尊重的。尽管如此，大饥荒时代仍然饿得浮肿。

我问他：你恨毛泽东吗？

他大声说：咱这国家不容易，恨毛主席的都是……（省略一串脏字）。

又询问了别的老人，基本上都差不多。虽然在那年头大家饿得七七八八，却仍然不恨毛泽东。这些人居于草野，没有声音。然而这些可以解释，为啥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中国依然安稳统一，就是因为农民。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军人来自农民，军官也是来自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军人总是站在毛泽东那边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一根手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的原因，这就是彭德怀和林彪这种军内大佬都没有力量反抗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你可以说这帮人没见识、没智慧，被宣传工具给愚弄了、被洗脑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懂一大堆知识，只是一群简单而缺乏思想的人。然而也该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整体向心力保证了国家的安稳，不是吗？

比起满清时代给洋人提供信息，比起民国期间帮助鬼子的那些农民要强很多，对不对？

个人认为，要解释上面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靠学术逻辑来推理是没有用的，靠攻击谩骂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客观事实。虽然那个客观事实在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愚昧落后，但确实存在过，并且为中国的涅槃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评：那是一个民族意识再次开启，但民族智慧等待开启的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吧。